

政府规模、政府质量与居民幸福感

陈 工 ,何鹏飞 ,梁若冰

(厦门大学 经济学院 福建 厦门 361005)

[摘 要] 采用2006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评估了政府规模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发现政府规模过大显著降低了居民幸福感,且对中西部、农村和低收入居民的损害更大,但政府质量能够削弱过大的规模对于幸福感的不利影响。此外,分项支出规模对居民具有异质性效应,即民生财政支出规模能够提升居民幸福感,而基本建设支出和行政管理费规模则会损害幸福感。“攫取之手”行为是政府规模影响居民幸福感的重要传导路径。

[关键词] 政府规模 政府质量 居民幸福感

[中图分类号] F81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9556(2016)05-0011-11

Government Size ,Government Quality and Residents' Happiness

CHEN Gong ,HE Peng-fei ,LIANG Ruo-bing

(School of Economics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361005 ,China)

Abstract : Using China General Social Survey (2006) data ,this paper evaluates the impact of government size on residents' happiness in China ,confirming that large government size narrows the residents' happiness significantly and the impact of government size on residents' happiness of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rural and low-income is bigger than that of counterparts. But government quality can weaken the negative impact of big government size. Moreover ,subentry expenditure has heterogeneous effect on happiness ,finding that the expenditure of People's livelihood significantly increases the subject well-being ,but the big expenditure of basic construction and administrative and management obviously reduces well-being. Finally ,“grabbing hand” is an important mechanism that government size affects residents' happiness.

Key Words : government size ,government quality ,residents' happiness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与此同时,市场日益复杂并产生了“拥挤”等外部性问题。对此,政府必须扩大职能,以管理更为庞杂的经济系统,并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这些都需要财政资金支持。因此,本文采用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指标来衡量政府规模,以了解政府职能的大小以及干预、管理国民经济的力度。从图1中可以看出,近10年来,我国的政府规模指数一直处于稳定增长的态势,

由2003年的0.18增长到2013年的0.25。但在2003年和2009年,政府规模出现小幅下降,这与当时的政府机构改革有关。总的来说,我国政府机构改革的成效并不大,目前的政府规模仍处于较高的水平。

政府是以人民利益为宗旨的权力机关,其追求的最终目标应是居民福利而非物质财富的最大化。主观幸福感是居民对生活的整体满意度,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衡量居民福利(Frey & Stutzer 2002)^[1]。从图1中可以看出,我国居民幸福感(5分制)并没有

[收稿日期] 2016-04-09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1573218),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0zd&036)

[作者简介] 陈 工(1958-),男,广东澄海人,厦门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经济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是财政理论与政策;何鹏飞(1989-),男,安徽铜陵人,厦门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是幸福经济学;梁若冰(1972-),男,山东蓬莱人,厦门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是公共经济学和应用微观计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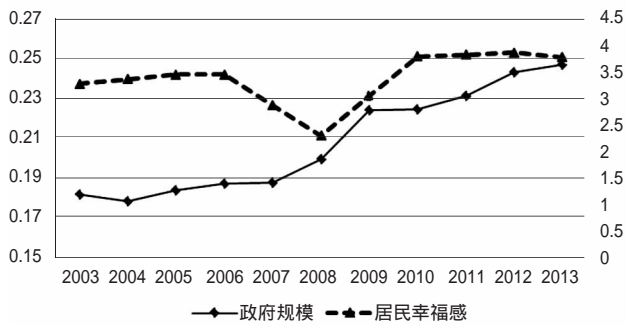


图1 政府规模与居民幸福感趋势图

注：幸福感数据取自历年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库(CGSS)，缺失省份数据采用插值法计算得到。

随着经济的增长而大幅提升，一直在3.2至3.75分之间小幅波动，出现了幸福停滞现象。此外，政府规模的膨胀与幸福停滞现象是相伴而生的，这两者之间会不会存在某种关联呢？已有研究发现，过大的政府规模会显著降低行政效率，滋生腐败，增加居民的“税负痛苦感”（陈迅、余杰，2005；周黎安、陶靖，2009）^[2,3]。由此可以合理推测，过大的政府规模会明显损害居民福利。现有文献多是从收入差距、机会不平等及腐败等角度探索幸福停滞现象（何立新、潘春阳，2012；陈刚、李树，2012）^[4,5]，鲜有文献从政府规模的角度进行研究。

现有关于政府规模与居民幸福感的研究大多没有控制遗漏变量和反向因果引起的内生性，从而出现了估计偏误等问题。相关文献也证实了内生性的确存在：一方面，政府质量能够显著提高居民幸福感（Helliwell & Huang, 2008；陈刚、李树，2012）^[6,5]，且政府规模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取决于政府质量的高低（Ott, 2011；Kim, 2012）^[7,8]，忽略政府质量因素会产生遗漏变量问题；另一方面，幸福感较高人群的生活态度更乐观，能够更积极地参与当地的政府治理（Veenhoven, 1988；Weitz-Shapiro, 2011）^[9,10]，这有助于遏制政府规模的盲目扩张，从而引发反向因果问题。总体来说，尚未有文献从政府规模的视角系统解释我国的幸福停滞现象。因此，对政府规模与居民幸福感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就显得非常必要，它既可以对“大政府”国家的政府规模与居民幸福感之间关系的研究进行有益的补充，也可以为经济发展过程中如何有效地提高居民幸福感提供对策建议。

二、文献综述与理论假说

关于政府规模与居民幸福感之间的关系，国外文献给出了三种结论。一是政府规模与居民幸福感呈“倒U型”关系，即存在最优政府规模，能使幸福感受到最大值。政府在为居民提供公共服务以满足其基本需求的同时，需要征税筹集资金维持政府的

运转，政府规模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取决于公共服务所带来的便利性与征税所造成的“税负痛苦”之间的权衡比较（Pigou, 1947）^[11]。若规模过小，则需要更大的征税努力以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若规模过大，则政府需要减少税负以降低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因此，最优政府规模是存在的。Sequeira等（2014）^[12]利用2003年和2007年欧洲生活质量调查数据进行分析后发现，政府规模与居民幸福感之间呈现“倒U型”关系，最优政府规模介于5%至7%之间。Scully（2011）^[13]分析了1995年112个国家的截面数据后也得到相同的观点，认为最优政府规模介于5.6%至18.6%之间。二是政府规模对居民幸福感存在有利的影响。根据福利经济学的观点，政府是一个“仁慈”的社会计划者，它以社会福利为自己的唯一目标，能够优化社会资源的配置。基于该逻辑，政府规模的增加可以明显提升居民的幸福水平。但是，当经济达到一般均衡状态时，政府规模的边际成本与边际收益相等，对居民幸福感不会产生影响。Hessami（2010）^[14]评估了12个欧洲国家1990年至2000年的政府规模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发现两者名义上呈现“倒U型”关系，但最优政府规模为GDP的115%，已经超出可观测的政府规模最大值，说明政府规模实际上是和居民幸福感正相关的。三是政府规模过大损害了居民幸福感。这是基于公共选择理论的逻辑判断，即政府是一个理性的“经济人”，其追求的目标不是社会福利最大化，而是诸如薪金、津贴、公众威望和权力等个人效用的最大化。由于公众威望等个人效用会随着规模的扩大而提升，这就导致政府盲目扩张规模并偏离最优值（Niskanen, 1971）^[15]，进而出现资源配置扭曲、权力寻租和公共品无效等问题（Tullock, 1959；Persson, 2000）^[16,17]，所以政府规模的扩张并不利于居民幸福感的提升。Bjørnskov等（2007）^[18]利用1997年至2007年的世界价值观调查数据进行分析后发现，全球74个国家的政府规模与居民幸福感负相关。

由国外的研究可知，政府规模与居民幸福感之间的关系在不同国家以及同一国家的不同时期会有所不同，如在不同的时期，欧洲政府规模与居民幸福感之间呈现“倒U型”和单调递增两种关系（Sequeira等，2004；Hessami, 2010）^[12,14]。这是因为，在一个国家发展的不同阶段，政府会扮演两种角色，即“攫取之手”和“援助之手”，政府规模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也就取决于这“两只手”效应的权衡比较。Olson（1993）^[19]借用“流寇”和“坐寇”详细地描述了这“两只手”：一般来说，“流寇”目光短浅，只顾眼前利益，最大程度地剥夺当地财富，更多扮演了“攫取之

手”的角色；“坐寇”长期占据一地，当地居民越富裕，其收益越大，因而“坐寇”为了获取更多的利益，会提供社会治安、基础设施等公共品，更多体现了“援助之手”的行为特征。这种描述其实也能部分解释现代政府的行为：如果政府目光长远，一心为公，更多地扮演“援助之手”的角色，则其会追求社会福利的最大化；若政府目光短浅，则其会扮演“攫取之手”的角色，只顾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从而损害社会福利。

一般来说，在一国发展的初期，政府往往励精图治，更偏向于增进社会福利，因而在该阶段其更多地扮演了“援助之手”的角色；当国家进入高速发展阶段时，政府目标往往会发生改变，其会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更多地扮演了“攫取之手”的角色；当经济进入发达阶段时，国家通常已经建立起良好的权力制约机制，政府权力被关进“笼子”里，“援助之手”的行为特征又会再次显现。可以说，在一个国家的不同发展阶段，政府规模与居民幸福感之间的关系会呈现单调递增、“倒U型”和单调递减三种形式。已有研究表明，这两种角色在当前阶段的中国都存在。文雁兵(2014)^[20]发现，政府规模扩张可以更有效地提供外部产品和跨区域的公共品（如环境保护、交通和国防等），政府更多地扮演了“援助之手”的角色，从而提高居民的幸福水平。周黎安和陶婧(2009)^[3]却发现，政府规模扩张会使官员拥有过多的政治资源和决策权，在监督机制不完善的情况下，贪污腐败、权力寻租、行政效率低下等诸多问题都会产生。杨子晖(2011)^[21]也认为，政府会扮演“攫取之手”的角色，规模过大不仅会加重企业和居民的税收负担，减少其可支配收入，而且会扭曲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

那么，我国的政府“攫取之手”效应究竟如何呢？陈抗等(2002)^[22]发现，自分税制改革至1998年期间，政府的“援助之手”效应明显减弱，并逐渐转变为“攫取之手”效应。考虑到该研究没有考察1998年以后的情况，我们参考陈抗等(2002)^[22]、方红生(2014)^[23]的做法，采用非预算内收入（预算外收入与土地出让金之和）与预算内收入之比度量“攫取之手”行为指数，借此分析政府的“攫取之手”效应。一般来说，该指数越大，政府“攫取之手”效应越明显，而“援助之手”效应越弱。本文测算了1998-2014年全国的“攫取之手”行为指数，结果见图2。可以看出，我国政府的“攫取之手”行为指数在样本初期不断恶化，由1998年的0.36上升到2003年的最大值0.46，其后在2004-2010年期间一直在0.35附近波动，2010年以后情况虽有明显改善，但至2014年为止“攫取之手”行为指数仍高达0.30。可见，政府在更

大程度上扮演了“攫取之手”的角色，而过大的政府规模会对居民幸福感产生明显不利的影响。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两个理论假说：

H1：当前阶段我国政府规模过大，明显损害了居民幸福感。

H2：“攫取之手”是政府规模影响居民幸福感的传导路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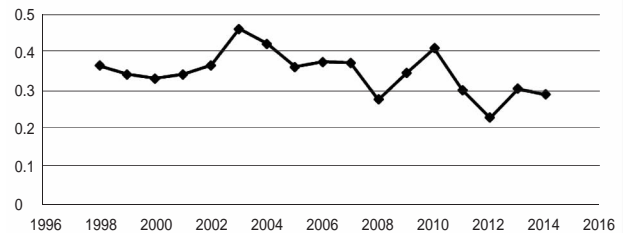


图2 1998-2014年中国“攫取之手”行为指数

三、实证策略与数据说明

(一) 回归模型

由于被解释变量居民幸福感是一个有序的分类变量（1=“非常不幸福”，2=“不幸福”，3=“一般”，4=“幸福”，5=“非常幸福”），因此，本文选择 Ordered Probit（简称 Oprobit）模型进行分析。该模型假定存在一个能够代表主观幸福感，但不能被观察到的连续潜变量 $happiness_{ic}^*$ ，该潜变量由公式(1)决定：

$$happiness_{ic}^* = \alpha_5 size_c + P_{ic} W_{ic} + C_c M_c + \varepsilon_{ic} \quad (1)$$

公式(1)中的下标 ic 表示城市 c 中的微观个体 i ， W_{ic} 为微观个体、家庭的特征变量， M_c 为城市 c 的特征变量， $size_c$ 表示城市 c 的政府规模。设 $C_1 < C_2 < C_3 < C_4$ 是未知的阈值点 (cut point)，当 $happiness_{ic}^*$ 小于或等于阈值 C_1 时，被访问者感到“非常不幸福”，取值为1；当 $happiness_{ic}^*$ 大于阈值 C_1 且小于或等于阈值 C_2 时，被访问者感到“不幸福”，取值为2；依此类推，当 $happiness_{ic}^*$ 大于 C_4 时，被访问者感到“非常幸福”，取值为5。具体定义如下：

$$happiness_{ic} = 1 \text{ 如果 } happiness_{ic}^* \leq C_1$$

$$happiness_{ic} = 2 \text{ 如果 } C_1 < happiness_{ic}^* \leq C_2$$

$$happiness_{ic} = 3 \text{ 如果 } C_2 < happiness_{ic}^* \leq C_3$$

$$happiness_{ic} = 4 \text{ 如果 } C_3 < happiness_{ic}^* \leq C_4$$

$$happiness_{ic} = 5 \text{ 如果 } happiness_{ic}^* > C_4$$

我们就“非常不幸福”、“不幸福”、“一般”、“幸福”、“非常幸福”分别构造似然函数，利用最大似然函数法估计出参数。在这个回归模型中，只要扰动项

与解释变量相互独立，则最大似然函数法得到的参数就是一致估计量。

(二)变量定义

1.居民主观幸福感(happiness)。幸福感的衡量指标取自2006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库中被访问者对问卷“总体而言，您对自己所过的生活的感觉是怎么样的呢？”的回答，被访问者在“1=非常不幸福”、“2=不幸福”、“3=一般”、“4=幸福”、“5=非常幸福”之间进行选择。调查结果显示，大部分居民的幸福感受处于“一般”和“幸福”水平，二者占全部调查人数的比重高达88.22%，具体情况如图3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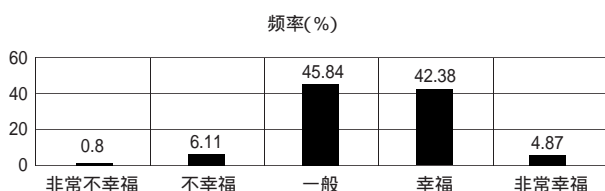


图3 居民幸福感的频率分布图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2006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计算整理。

2.政府规模(size)。衡量政府规模的常用指标有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和财政供养人口占全部人口的比重。由于财政供养人口不仅包括政府部门的人员，还包括事业单位人员，如教师等，因而其不能准确衡量政府规模。考虑到财政支出能够反映政府在预算范围内行使政府职能的影响，本文采用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指标衡量政府规模。

3.政府质量(quality)。借鉴陈刚和李树(2012)^[5]的做法，本文采用政府效率(efficiency)、公共品供给(pub_good)和财产权利保护(protect)衡量政府质量。其中，测度政府效率的指标有企业的税费支出、企业娱乐和旅游开支、出口通关天数和与政府打交道时间，测度公共品供给的指标有工业废气无害化处理率、人均绿地面积、空气质量的优良天数和新生儿死亡率，测度财产权利保护的指标有对法庭的信心。本文将上述指标标准化并运用主成分分析法，测度了2005年120个城市的政府质量及其分项指标。

4.控制变量。参考已有的研究(Frey & Stutzer, 2002)^[1]，居民幸福感还受到个人、家庭和经济社会特征等变量的影响。基于此，我们在回归模型中引入多个变量，以避免遗漏变量带来的估计偏误问题。

本文个体层面的变量包括个人的绝对收入(income)、个人自评收入的合理程度(inco_reso，“非常合理”、“合理”、“不合理”、“非常不合理”分别赋值为1~4的整数)、性别(male，男性赋值为1，女性赋值为0)、工作状况(employ，失业赋值为1，有工作或退休

赋值为0)、是否参与投票(vote，参与投票赋值为1，未参与投票赋值为0)、是否汉族(han，汉族赋值为1，少数民族赋值为0)、是否党员(party，党员赋值为1，非党员赋值为0)、是否单身(single，单身赋值为1，非单身赋值为0)、是否城镇户口(city，城镇户口赋值为1，农村户口赋值为0)、受教育程度(包括未接受教育、初等教育 prim、高中教育 high 和高等教育 univer)、年龄(age，居民在2005年时的周岁)、健康状况(“非常不满意”、“不太满意”、“比较满意”、“非常满意”分别赋值为1~4的整数)、居民自评与三年前相比的收入状况(status，“上升了”、“差不多和不好说”、“下降了”分别赋值为1~3的整数)。家庭层面的变量主要包括家庭绝对收入(fam_inco)、家庭相对收入(fam_rank，“上层”、“中上层”、“中层”、“中下层”、“下层”分别赋值为1~5的整数)。城市层面的变量主要包括人均国内生产总值(pgdp，衡量地方经济的发展程度)、基尼系数(gini，根据城市中个人的绝对收入，利用STATA中的ainequal命令计算得到，以衡量收入不平等)。

(三)样本数据

本文使用的数据是微观个体调查数据，来自于2006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库。在删除了所有异常样本点后，有效样本共有3720个。这些样本来自于52个城市，其中，东部城市有24个，中部城市有15个，西部城市有13个。城市层面的变量数据来源于《全国地县市财政统计资料》、《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和CEIC数据库。受CGSS数据库完成时间的限制^①，所有城市数据均滞后了一年，为2005年的数据。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1。

表1 描述性统计

variable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happiness	居民幸福感(0~5)	3.4597	0.7076	1	5
size	政府规模(/)	0.1019	0.035	0.0585	0.1748
quality	政府质量(/)	0.683	0.0996	0.3914	0.9012
efficiency	政府效率(/)	0.7388	0.0919	0.4227	0.92
pub_good	公共品供给(/)	0.6936	0.1233	0.2272	0.8436
protect	财产权利保护(/)	0.6112	0.1861	0.0123	1
age	年龄(岁)	45.1745	12.776	19	71
income	绝对收入(万元)	1.2732	1.9562	0.006	67
inco_reso	收入是否合理(1~4)	2.536	0.6533	1	4
vote	投票(0,1)	0.2836	0.4508	0	1
male	性别(0,1)	0.4911	0.5	0	1
han	民族(0,1)	0.9801	0.1396	0	1
prim	初等教育(0,1)	0.5247	0.4995	0	1
high	高中教育(0,1)	0.2728	0.4455	0	1
univer	高等教育(0,1)	0.1444	0.3515	0	1

(续表 1)

party	党员(0,1)	0.1078	0.3102	0	1
health	健康状况(1~4)	2.0804	0.6622	1	4
employ	失业(0,1)	0.0645	0.2457	0	1
fam_inco	家庭收入(万元)	3.1986	1.8765	0.03	800
fam_rank	家庭收入排名(1~6)	3.9691	0.9182	1	6
single	单身(0,1)	0.1527	0.3597	0	1
city	城镇户口(0,1)	0.6817	0.4659	0	1
status	自评社会经济状况(1~3)	1.6444	0.677	1	3
gini	基尼系数(/)	0.4185	0.0785	0.2591	0.6619
pgdp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万元)	2.4273	1.5875	0.4799	6.9268

四、实证分析

(一) 基准回归结果

我们利用公式(1)对政府规模与居民幸福感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回归结果见表2。其中,列(1)、(3)、(5)分别为没有控制任何变量、控制政府质量及控制所有变量的回归结果,列(2)、(4)、(6)分别为在列(1)、(3)、(5)的基础上加入政府规模平方项的回归结果,用以考察政府规模与居民幸福感之间是否呈现“倒U型”关系。其他变量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结果表2也一并予以汇报。

表2 政府规模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

	幸福感	幸福感	幸福感	幸福感	幸福感	幸福感
	(1)	(2)	(3)	(4)	(5)	(6)
size	-2.2561*** (0.5160)	-7.9430** (3.9585)	-2.0646*** (0.5190)	-7.3083* (3.9642)	-2.5613*** (0.6144)	-7.4754* (4.3355)
size2		24.6968 (17.0438)		22.7616 (17.0589)		21.6828 (18.9360)
quality			0.6367*** (0.1823)	0.6287*** (0.1824)	0.7066*** (0.2019)	0.7241*** (0.2025)
age					-0.0568*** (0.0111)	-0.0568*** (0.0111)
age2					0.0006*** (0.0001)	0.0006*** (0.0001)
income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inco_reso					-0.2854*** (0.0311)	-0.2860*** (0.0311)
employ					-0.1588** (0.0778)	-0.1591** (0.0778)
vote					0.0345 (0.0431)	0.0311 (0.0432)
male					-0.0580 (0.0386)	-0.0578 (0.0386)
han					-0.0045 (0.1337)	-0.0105 (0.1338)
prim					0.1537* (0.0851)	0.1510* (0.0851)
high					0.2516*** (0.0953)	0.2465*** (0.0954)

univer					0.3186*** (0.1073)	0.3154*** (0.1073)
party					0.2235*** (0.0647)	0.2224*** (0.0647)
health					-0.3611*** (0.0298)	-0.3622*** (0.0298)
fam_inco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fam_rank					-0.1948*** (0.0224)	-0.1953*** (0.0224)
single					-0.6768*** (0.0571)	-0.6747*** (0.0572)
status1					-0.2134*** (0.0296)	-0.2120*** (0.0297)
city					0.1882*** (0.0520)	0.1931*** (0.0522)
pgdp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gini					0.1037 (0.2659)	0.0420 (0.2713)
准 R ²	0.1100	0.1100	0.1100	0.1100	0.1100	0.1100
观测值	3720	3720	3720	3720	3720	3720

注:括号中为标准误,***、**、*分别表示1%、5%、10%的显著性水平。

表2的回归结果显示,政府规模的估计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但政府规模平方项的估计系数并不显著,说明政府规模与居民幸福感之间并不呈现“倒U型”关系,而是线性降低了居民的幸福水平,从而验证了理论假说1。这与国情也是相符的,2005年我国的政府规模高达19%,远超过最优规模值,此时政府可能更多地扮演了“攫取之手”的角色,因而对居民幸福产生了不利影响。由列(5)可知,政府规模每提高1个标准差(0.035),幸福感就会降低0.09(-2.5613×0.035),而国民幸福会减少2.6%(-0.09/3.46)。

此外,政府质量越高,居民幸福水平就越高。从估计系数来看,政府质量每提高1个标准差(0.0996),居民幸福感会提高2%。这是因为,提高政府质量能够促进经济增长,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增加制度信任和社会信任(陈刚、李树,2012)^[5]。年龄与居民幸福感为非线性相关,呈现“U型”关系,这与大多数居民在中年阶段面临较大生活压力的情况相符。个人自评收入状况的合理程度^②与居民幸福感负相关,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自评收入状况越不合理,居民幸福感就越差。从教育程度来看,初等、高中和大学教育显著提高了居民的幸福,且其影响随着居民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而逐渐增强。党员身份对居民幸福感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这与党员身份可能会带来一定的政治利益和社会资本有关。个人自评健康状况在1%的水平上对居民幸福感具有显著的正

向影响,说明健康状况越好,居民的幸福感应越强。城镇居民的主观幸福感要高于农村居民,这与城镇居民能够享受更好的基础设施及教育、医疗卫生等基本公共品高度相关。个人和家庭相对收入对居民幸福感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绝对收入没有影响,说明居民更关注相对收入的高低,这主要是因为相对收入较高的居民处于优势地位,在心理上会产生优越感。

(二)分群样本估计结果

很多学者考察了公共支出影响居民幸福感的分群样本异质性效应。汤凤林、雷鹏飞(2014)^[24]发现,相对于高收入居民来说,财政支出对中等收入居民幸福感的提升作用更强。鲁元平(2010)^[25]、胡洪曙等(2012)^[26]发现,民生财政支出(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对农村和中西部地区居民幸福感的影响要比城镇和东部地区大。为了考察政府规模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是否存在分群样本异质性,本文检验了政府规模对城乡、高低收入及东中西部地区居民幸福水平的影响,回归结果见表3。

表3 政府规模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分群样本估计

	城市	农村	低收入	高收入	东部	中西部
	(1)	(2)	(3)	(4)	(5)	(6)
size	-2.0706** (0.7562)	-3.8979** (1.3434)	-2.8123** (0.6716)	-1.4777 (1.6714)	-2.1120** (0.9242)	-4.6794** (1.1609)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准R ²	0.1251	0.1049	0.1092	0.1102	0.1311	0.1074
观测值	2536	1184	3183	537	2025	1695

首先,我们根据户籍将居民划分为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两个子样本,并运用 Oprobit 方法进行分析,回归结果见列(1)、(2)。结果表明,政府规模过大明显损害了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幸福感,但对城镇居民的影响要小一些。这是因为,相对于农村居民而言,城镇居民可以享受更多的公共服务,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弱政府规模对幸福感的损害。

其次,我们根据收入水平将居民划分为低收入和高收入样本,再将全部样本从低到高排序,前50%的居民被定义为低收入群体,其收入低于2万元,后50%的居民被定义为高收入群体,其收入高于2万元,回归结果见列(3)、(4)。结果表明,政府规模过大明显损害了低收入居民的幸福感,但对高收入居民的影响并不显著。这是因为,相对于低收入居民而言,高收入居民处于优势地位,能够利用自身条件“俘获”政府,进而规避负向影响。

再次,我们根据地理位置将样本划分为东部与中西部两个子样本,回归结果见列(5)、(6)。结果表

明,政府规模过大对所有地区的居民幸福感均存在负向影响,且对东部居民的影响明显小于中西部。这是因为,相对于中西部地区而言,位于东部地区的政府受到了更加严格的监督,能够提供优质的公共服务,因而居民幸福感的损失更小。

(三)政府规模对居民幸福感的边际效应

根据表2的结果,我们计算了政府规模对居民幸福感的边际效应,以考察居民对不同幸福水平的感受变化情况,具体结果见表4。其中,列(1)至(5)分别为政府规模与“非常不幸福”、“不幸福”、“一般”、“幸福”和“非常幸福”概率的回归结果。

表4 政府规模对居民幸福感的边际效应

	非常不幸福	不幸福	一般	幸福	非常幸福
	(1)	(2)	(3)	(4)	(5)
size	0.0130*** (0.0045)	0.2037*** (0.0503)	0.8032*** (0.1937)	-0.8496*** (0.2049)	-0.1703*** (0.0421)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准R ²	0.1098	0.1098	0.1098	0.1098	0.1098
观测值	3720	3720	3720	3720	3720

由表4可知,政府规模在1%的水平上对居民幸福感具有显著影响,但影响大小和方向并不一致。具体来说,政府规模每提高1个标准差(0.035),居民感到“非常不幸福”、“不幸福”、“一般”的概率分别增加0.04%、0.71%、2.81%,而感觉“幸福”和“非常幸福”的概率相应下降2.97%和0.60%。可见,政府规模对“一般”和“幸福”的影响较大。样本中“一般”和“幸福”的平均概率为45.27%和43.36%,这意味着政府规模每提高1个标准差(0.035),居民感到“一般”和“幸福”的概率就会相应增加6.21%或减少6.86%。这个效果是相当明显的,也从一个侧面验证了政府规模损害居民幸福感的结论。

(四)稳健性检验

首先,前文是用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指标衡量政府规模,而吕炜等(2009)^[27]、文雁兵(2014)^[20]认为,行政管理费占GDP的比重(size_admin)、人均行政支出(size_admin1)、人均财政支出(size1)、人均财政供养人口(size_gy)等指标也能反映政府规模的大小。为了保证结果的稳健性,本文采用 Oprobit 方法检验上述替代指标与居民幸福感之间的关系,结果见表5的列(1)至(4)。回归结果中只有以人均财政供养人口指标衡量的政府规模平方项显著,为了简便起见,我们仅在列(4)中汇报了政府规模平方项的估计结果。由列(1)至(3)可知,以行政管理费占GDP的比重、人均行政支出和人均财政支出衡量的政府规模对居民幸福感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但列(4)的结果表明,以人均财政供养人口衡量的政府规模与

居民幸福感呈现“倒 U 型”关系,最优政府规模为 28.71,小于样本城市的平均政府规模 28.81。可见,以人均财政供养人口衡量的政府规模过大,超过了最优规模值,因而其对居民幸福感会产生明显不利的影响。列(1)至(4)表明,本文的结果不因政府规模衡量方法的改变而发生变化,具有一定的稳健性。

表 5 以其他指标衡量的政府规模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

	幸福感	幸福感	幸福感	幸福感
	(1)	(2)	(3)	(4)
size_admin	-21.1131*** (4.5200)			
size_admin1		-0.0095*** (0.0024)		
size1			-0.0007*** (0.0002)	
size_gy				0.08613*** (0.0235)
size_gy2				-0.0015*** (0.0004)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准R ²	0.1104	0.1096	0.1096	0.1121
观测值	3720	3720	3720	3720

其次,被解释变量居民幸福感是主观评价指标,不可避免地会存在测量误差问题,如部分微观个体在“不幸福”与“一般”、“一般”与“幸福”之间难以选择,从而有可能误判自身的幸福水平。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本文对居民幸福感重新赋值,赋值的规则是将“非常不幸福”赋值为 1,将“不幸福”、“一般”和“幸福”统一赋值为 2,将“非常幸福”赋值为 3。我们对模型重新进行了计量分析,回归结果见表 6。其中,列(1)至(5)分别为行政管理费占 GDP 的比重、人均行政支出、财政支出占 GDP 的比重、人均财政支出、人均财政供养人口与重新赋值的居民幸福感的回归结果。我们发现,政府规模过大显著损害了居民的幸福水平,说明幸福感的测量误差并不影响结果的稳健性。

再次,政府规模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可能会依赖经济和政治因素,本文对此做了两项稳健性检验。^③一是为了规避经济异常样本点影响政府规模与居民幸福感之间的关系,本文剔除了 10%的经济最不发达城市和 10%的最发达城市,并对子样本进行回归分析,发现过大的政府规模仍然对居民幸福感产生了负向影响。二是考虑到直辖市、省会城市与非省会城市政治地位的差别,本文将样本划分为直辖市、省会样本和非省会样本,再次对子样本进行了分析,发现政府规模仍然显著影响了居民的幸福水平。这表明本文的研究结论是稳健的,没有受到经济和政治因素的影响。

表 6 政府规模对重新赋值的居民幸福感的影响

	幸福感	幸福感	幸福感	幸福感	幸福感
	(1)	(2)	(3)	(4)	(5)
size_admin	-5.3996*** (1.2441)				
size_admin1		-0.0173*** (0.0044)			
size			-31.4449*** (9.0336)		
size1				-0.0014*** (0.0003)	
size_gy					-0.0022 (0.0070)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准R ²	0.1367	0.1367	0.1367	0.1367	0.1263
观测值	3720	3720	3720	3720	3720

最后,政府规模与居民幸福感之间可能存在反向因果关系,故本文的研究结论可能会受到内生性的影响。为了得到一致性的估计结果,我们选用各城市的历史时期人口密度和政府规模分别作为政府规模的工具变量对公式(1)进行计量分析。之所以选取历史时期的人口密度和政府规模作为工具变量,是基于以下两点考虑:一是建国初期政府规模在设定时主要考虑了人口密度因素,而历史政府规模数据更能反映当今政府规模的大小,因而工具变量从理论上而言是合适的,且能满足相关性条件(周黎安、陶婧,2012)^[3];二是居民幸福感对历史人口密度和政府规模无法产生影响,满足工具变量的外生性条件。受人口密度和政府规模数据获得时间的限制,本文选用 1994 年的人口密度和政府规模作为工具变量。

表 7 政府规模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工具变量估计

	IV-2SLS		IV-Oprobit	
	幸福感	幸福感	幸福感	幸福感
	(1)	(2)	(3)	(4)
size	-1.1975** (0.5218)	-2.8768*** (0.6585)	-1.9206** (0.8156)	-5.1607*** (1.1681)
控制变量	NO	YES	NO	YES
R ² /准 R ²	0.005	0.208	0.0024	0.1098
观测值	3720	3720	3720	3720

本文采用工具变量法对公式(1)进行计量分析,回归结果见表 7。为简便起见,这里仅汇报了第二阶段的回归结果。其中,列(1)、(2)、(3)、(4)为采用 2SLS 和 IV-Oprobit 方法的估计结果,列(1)、(3)没有控制任何变量,而列(2)、(4)控制了个体和城市层面的变量。工具变量的回归结果表明,政府规模过大显著降低了居民的幸福水平,且在克服了内生性后,影

响变得更大。具体来说,政府规模每提高 1 个标准差(0.01),居民幸福感就会下降 5.2 个百分点,说明本文的结论并没有因内生性而发生改变。

五、对异质性的进一步分析及机制分析

(一)政府规模影响居民幸福感的异质性

已有研究表明,政府规模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在政府质量不同的地区之间存在异质性。Ott (2010, 2011)^[28]利用盖普洛世界民意调查(Poll)中 127 个国家的幸福感数据进行了分析,发现政府规模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与政府质量负相关,即在质量越高的地区,过大的政府规模对居民幸福感的危害越小。Kim(2012)^[8]根据规模和质量将政府划分为四类,即“小政府高质量”、“大政府高质量”、“小政府低质量”和“大政府低质量”,发现这四类政府对居民幸福感的提升效应依次递减。可见,政府规模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质量的高低。但现有文献尚未研究异质性在中国是否也存在,为此,本文在回归方程中纳入了政府规模与政府质量的交叉项。事实上,能够代表政府质量的指标有很多,除了政府效率、公共品供给和财产权利保护以外,常见的指标还有政府腐败水平(corruption)、财政透明度(transpar)等(陈刚、李树,2013;Kaufmann & Kraay, 2002)^[29,30]。这里,我们用每十万人职务犯罪数、《中国财政透明度报告(2009)》中 2006 年省级财政透明度的相对得分指标进行衡量。^④为了便于比较影响的大小,我们对腐败和财政透明度进行了标准化处理,分别纳入计量方程,并采用 Oprobit 方法进行分析,回归结果见表 8。

表 8 政府规模影响居民幸福感的异质性分析

	幸福感	幸福感	幸福感	幸福感	幸福感	幸福感
	(1)	(2)	(3)	(4)	(5)	(6)
size	-19.8532*** (5.016)	-9.1464** (3.972)	-6.9128** (1.398)	-0.8968 (1.350)	-4.1063*** (0.8031)	-6.0242*** (0.8085)
size* quality	25.5541*** (7.3565)					
size* efficiency		8.4808* (5.0538)				
size* pub_good			6.5569*** (1.8916)			
size* protect				-2.8766 (2.0775)		
size* corruption					-2.6625*** (0.8904)	
size* transpar						23.2328*** (3.5352)
quality	-1.6908** (0.7190)	0.1012 (0.4134)	0.3053 (0.2329)	1.1372*** (0.3708)	0.8246*** (0.2058)	0.9386*** (0.2081)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R ² /准R ²	0.1117	0.1117	0.1117	0.1117	0.1117	0.1117
观测值	3720	3720	3720	3720	3720	3720

表中,列(1)至(6)分别为政府规模与政府质量、政府效率、公共品供给、财产权利保护、腐败、财政透明度对幸福感的异质性估计结果。由列(1)可知,政府规模与政府质量的交叉项系数显著为正,说明政府质量的提高能够降低过大的规模对幸福感的负面影响。这与我们的逻辑是一致的,即高质量的政府能够限制公务人员追求私利的行为并提高其服务意识和能力,因而在规模相同的情况下,“好”政府相对于“坏”政府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弱规模对幸福感的损害。同样,由列(2)、(3)可知,政府效率和公共品供给也能弥补政府规模过大的不利影响,这与我们的直觉是吻合的:在规模一定的情况下,更高的效率意味着政府能够更快、更好地提供教育、医疗和环境等公共品,从而提高居民对政府服务的满意度。列(4)的结果表明,政府规模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并不因财产权利保护力度的强弱而有所差别,这与当前我国居民法律意识淡薄以及财产纠纷较少的事实高度相关。从列(5)、(6)来看,政府规模与腐败和财政透明度的交叉项系数分别显著为负和正,表明控制腐败水平和提高财政透明度能够抑制规模对幸福感的损害。这是基于以下的逻辑:腐败刺激了政府自私自利的行为,使其将更多的精力用于寻租,导致服务水平下降;但财政透明度为社会公众监督政府提供了前提条件,抑制了政府行为的扭曲。从交叉项的估计系数来看,在规模相同的情况下,财政透明度、政府效率、公共品供给、腐败和财产权利保护对居民幸福感的促增作用依次递减,这意味着财政透明对政府规模过大的负面影响具有最强的抑制效应。

(二)分项支出规模影响居民幸福感的异质性

根据能否直接促进经济增长,本文将财政支出划分为生产性支出和非生产性支出(傅勇、张晏,2007)^[31]。生产性支出是指经济建设支出,非生产性支出则包括两大类:一是民生财政支出,即政府提供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来保障公民的基本生活;二是行政管理费,即政府提供必要的资金维持自身的运转,属于消耗性支出。可见,这三类支出的功能并不相同,其对幸福感的影响也可能存在异质性。因此,本文在计量方程中将政府规模替换为民生财政支出规模(size_ms)、基本建设支出规模(size_const)及行政管理费规模(size_admin),采用 Oprobit 方法进行分析,回归结果见表 9。

表 9 分项政府规模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

	幸福感	幸福感	幸福感	幸福感
	(1)	(2)	(3)	(4)
size_ms	9.0084** (3.7279)			7.5709** (2.9705)

(续表 9)

size_const		-12.9959*** (3.4022)		-13.2042*** (3.6370)
size_admin			-21.1131*** (4.5200)	-29.5545*** (6.5183)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R ² /准R ²	0.1099	0.1099	0.1099	0.1099
观测值	3720	3670	3720	3670

表中,列(1)至(4)分别为加入民生财政支出规模、基本建设支出规模、行政管理费规模以及同时加入三项支出规模后的回归结果。从列(1)来看,扩大民生财政支出规模显著提升了居民幸福感。这是因为,增加民生财政支出可以重新配置资源,将竞争激烈的私人消费转移到低竞争性的公共支出领域,从而减弱了攀比效应对幸福感的不利影响(鲁元平、张克中,2010)^[25]。从列(2)来看,基本建设支出规模过大明显损害了居民的幸福水平。这是因为,在当前以“GDP为王”的政绩考核体系下,地方政府为增长而竞争,只重视增长效应明显的基本建设投资,而忽视了教育、医疗等民生领域的投资。这不仅会导致基础设施过度投资、投入绩效低下等诸多问题,而且会“挤占”民生财政支出规模,严重影响居民的幸福水平。列(3)中行政管理费规模过大对居民幸福感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这是因为,用于政府部门自身运转的消费性支出规模越大,政府消耗的资金越多,就越可能出现资金使用效益低下、贪污腐败等问题。列(4)为了避免遗漏变量问题,将所有的支出规模同时加入方程,回归结果没有发生改变,说明我们的结论是稳健的。

(三)政府规模影响居民幸福感的机制分析——“攫取之手”

由图 2 可知,政府“攫取之手”行为指数经历着“缩小—增加—缩小—再增加”的循环,“攫取之手”行为无法得到遏制,这与我国政府规模所经历的“精简—膨胀—精简—再膨胀”极为相似。具体来看,政府规模在 1998、2003、2008、2013 年经历了较大的改革,“攫取行为”指数在 1998、2003、2010、2013 年也出现了明显下降。两者的变化趋势仅在 2008 年不一致,这与当时的改革情况相符。2008 年改革的重点是加强宏观调控、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等,组建了国家能源局、工业和信息化部、交通运输部和环境保护部等诸多部门,因而“攫取之手”行为指数会出现短期上升的现象。从全国层面来看,政府规模的膨胀的确增加了“攫取之手”行为,但不能说明其与省级政府之间的关系。因此,本文计算了 1998—2014 年省级政府的“攫取之手”行为指数与政府规模,并绘出

两者之间的散点和趋势图。从图 4 来看,省级政府规模与“攫取之手”行为指数之间呈现明显的正向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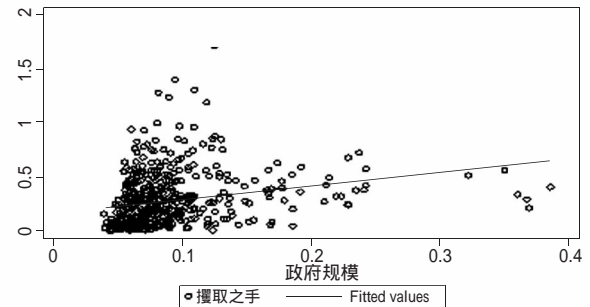


图 4 “攫取之手”行为指数与政府规模

事实上,自 1994 年分税制改革以来,我国政府一直处于快速扩张阶段,其规模在 2013 年高达 25%,远远大于政府自身的容忍能力,如早在 2005 年我国就强调精简机构并减少了财政供养人口。因此,本文认为,当前阶段我国的政府规模过大,更多地扮演了“攫取之手”的角色,容易引发贪污腐败、环境污染等问题,严重损害居民的幸福水平。本文考察了政府规模对“攫取之手”以及“攫取之手”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以验证“攫取之手”机制的存在性,实证结果见表 10。列(1)、(2)是考察政府规模对“攫取之手”行为指数的影响,列(3)、(4)是考察“攫取之手”行为指数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列(1)、(3)没有加入控制变量,列(2)、(4)加入了控制变量。

表 10 “攫取之手”的作用机制分析

	“攫取之手”	“攫取之手”	幸福感	幸福感
	(1)	(2)	(3)	(4)
size	1.6201*** (0.2206)	0.3635* (0.2059)		
hand			-0.1001* (0.0585)	-0.1426** (0.0697)
控制变量	NO	YES	NO	YES
准R ²	0.1045	0.3717	0.1081	0.1081
观测值	494	494	4252	3720

由列(1)、(2)可知,政府规模对“攫取之手”行为指数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平均而言,政府规模每提高 1 个百分点,“攫取之手”行为指数就会增加 11.59 个百分点。可见,政府规模越大,“攫取之手”行为特征就会越明显。由列(3)、(4)可知,“攫取之手”行为指数在 5% 的水平上对居民幸福感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平均而言,“攫取之手”行为指数每提高 1 个百分点,居民幸福感就会下降 0.7 个百分点。可见,“攫取之手”行为引起的诸多问题已经严重损害了居民的幸福水平。由列(1)至(4)可知,“攫取之手”的确是

政府规模影响居民幸福感的作用机制,这从计量上再次验证了本文的理论假说2。

六、研究结论与理论启示

(一)研究结论

本文采用2006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考察了政府规模与居民幸福感之间的关系,并得出四个结论。首先,政府规模过大显著降低了居民的幸福感受,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政府规模每提高1个标准差(0.01),居民幸福感受就会下降2.6个百分点。我国的城乡、东中西部以及不同收入阶层的经济社会条件存在很大差异,政府规模对它们的影响也有所不同。研究结果表明,过大的政府规模明显损害了低收入阶层居民的幸福感受,但对高收入阶层居民没有影响,其对中西部区和农民幸福感受的影响较东部地区和城镇居民更大,即政府规模过大不仅损害了居民的幸福感受,而且扩大了城乡、地区及收入阶层间的幸福差距,不利于社会公平。其次,本文从政府质量的角度考察了政府规模影响居民幸福感受的异质性,发现高质量的政府能够弱化规模对幸福感受的不利影响。从质量的分项指标来看,财政透明度、政府效率、公共品供给、腐败和财产权利保护的影响逐渐减弱。再次,本文考察了不同支出规模对居民幸福感受的影响,发现提高民生财政支出规模能够显著提升居民幸福感受,而扩大基本建设和行政管理费规模则会降低居民的幸福水平。最后,本文在理论和经验上均证明,“攫取之手”行为是政府规模影响居民幸福

感受的传导机制。

(二)理论启示

对于如何提升我国的福利水平(幸福感受),本文的研究提供了三点启示。首先,政府规模过大显著损害了居民的福利水平,故应严格限制地方政府规模的扩张。其核心在于清楚界定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在此基础上政府要转变职能,逐渐从市场能做以及政府做不好的领域退出。其次,“GDP为王”的政绩考核体系扭曲了政府的支出结构,严重损害了居民的幸福感受。因此,应改革政绩考核体系,优化政府内部支出结构,加大政府在教育、医疗、社会保障与就业等民生领域的投资,减少基本建设和行政管理费支出,不断提高居民的福利水平。再次,高水平政府治理能够抑制过大的政府规模对居民幸福感受的负面影响,故应在限制政府规模的同时,下大力气提高政府质量。这可以从向社会公开政府信息、加强社会对政府的监督等方面着手。

(三)研究不足与展望

本文虽采用了更具代表性的微观调查数据,但仅是从静态角度研究了政府规模、政府质量对居民幸福感受的影响。另外,我国很多国有企业承担着部分政府职能,如何将该因素考虑在内并合理度量广义政府规模,也是一项具有挑战性的工作。因此,正确度量广义政府规模并考察其与居民幸福感受之间的动态关系,应是未来研究的重点。

注释:

- ① 2006年的CGSS数据库采集工作于2006年9月和10月完成。
- ② 自评收入合理程度为个人对实际收入与期望收入之间差距的心理感受。
- ③ 限于篇幅,本文没有汇报政府规模对居民幸福感受的影响未受经济和政治因素干扰的回归结果。
- ④ 由于财政透明度指标的统计年份最早为2006年且短期内变化不大,故我们采用了2006年的透明度指标。

[参考文献]

- [1] Frey B S, Stutzer A. What Can Economists Learn from Happiness Research [J].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2002, 40(2): 402-435.
- [2] 陈迅, 余杰. 公共支出对我国技术效率的影响分析[J]. 财经科学, 2005(12): 5-17.
- [3] 周黎安, 陶婧. 政府规模、市场化与地区腐败问题研究[J]. 经济研究, 2009(1): 57-69.
- [4] 何立新, 潘春阳. 破解中国的“Easterlin悖论”: 收入差距、机会不均与居民幸福感受[J]. 管理世界, 2011(8): 11-22.
- [5] 陈刚, 李树. 政府如何能够让人幸福?——政府质量影响居民幸福感受的实证研究[J]. 管理世界, 2012(8): 55-67.
- [6] Helliwell J F, Huang H. How's Your Government? International Evidence Linking Good Government and Well-Being[J].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2008, 38(4): 595-619.
- [7] Ott J. Government and Happiness in 130 Nations: Good Governance Fosters Higher Level and More Equality of Happiness[J].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2011, 102(1): 3-22.
- [8] Kim S, Kim D. Does Government Make People Happy? Exploring New Research Directions for Government's Roles in Happiness[J]. Journal of Happiness Studies, 2012, 13(5): 875-899.
- [9] Veenhoven R. The Utility of Happiness[J].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1988, 20(4): 333-354.

- [10] Weitz-Shapiro R ,Winters M S.The Link between Voting and Life Satisfaction in Latin America [J].Latin American Politics and Society 2011 ,53(4) :101-126.
- [11] Pigou A C.A Study in Public Finance[M].London :MacMillan ,1947.
- [12] Sequeira T ,Minas T ,Ferreira-Lopes A.Do Large Government Decrease Happiness[R].New York :Working Paper 2014.
- [13] Scully G W.Government Expenditure and Quality of Life[J].Public Choice 2001 ,108(1) :123-145.
- [14] Hessami Z.The Size and Composition of Government Spending in Europe and Its Impact on Well-Being [J]. Kyklos , 2010 ,68(3) 346-382.
- [15] Niskanen W A.Bureaucracy and 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M].Chicago :Aldine Atherton ,1971.
- [16] Tullock G.Problems of Majority Voting[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59 ,67(6) 571-579.
- [17] Persson T ,Roland G ,Tabellini G.Comparative Politics and Public Finance [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2000 ,108(6) : 1121-1161.
- [18] Bjørnskov C ,Dreger A ,Fischer J A V.The Bigger the Better? Evidence of the Effect of Government Size on Life Satisfaction around the World[J].Public Choice 2007 ,130(3) 267-292.
- [19] Olson M.Dictatorship ,Democracy and Development[J].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993 ,87(3) 567-576.
- [20] 文雁兵.政府规模的扩张偏向与福利效应——理论新假说与实证再检验[J].中国工业经济 2014(5) 31-43.
- [21] 杨子晖.政府规模、政府支出增长与经济增长关系的非线性研究[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11(6) :77-173.
- [22] 陈 抗 ,Arye L Hillman ,顾清扬.财政集权与地方政府行为变化——从援助之手到攫取之手[J].经济学(季刊) 2002 (2) :111-130.
- [23] 方红生 ,张 军.财政集权的激励效应再评估 :攫取之手还是援助之手 ?[J].管理世界 2014(2) 21-31.
- [24] 汤凤林 ,雷鹏飞.收入差距、居民幸福感与公共支出政策——来自中国社会综合调查的经验分析[J].经济学动态 2014 (4) :41-55.
- [25] 鲁元平 ,张克中.经济增长、亲贫式支出与国民幸福——基于中国幸福数据的实证研究[J].经济学家 2010(11) 5-14.
- [26] 胡洪曙 ,鲁元平.公共支出与农民主观幸福感——基于CGSS数据的实证分析[J].财贸经济 2012(10) 23-33.
- [27] 吕 炜 ,单 双.政府规模与公共服务水平关系研究——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分析[J].财经科学 2009(3) :106-115.
- [28] Ott J.Good Governance and Happiness in Nations :Technical Quality Precedes Democracy and Quality Beats Size[J].Journal of Happiness Studies 2010 ,11(3) 353-368.
- [29] 陈 刚 ,李 树.管制、腐败与幸福——来自CGSS(2006)的经验证据[J].世界经济文汇 2013(4) 37-58.
- [30] Kaufmann D ,Kraay A.Growth without Governance[J].Economia 2002 ,3(1) :169-229.
- [31] 傅 勇 ,张 晏.中国式分权与财政支出结构偏向 :为增长而竞争的代价[J].管理世界 2007(3) :4-22.

[责任编辑：高 巍]